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山东女子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荀子管理思想论

李慧芬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荀子管理思想论

李慧芬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荀子管理思想论/李慧芬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209 - 08354 - 6

I. ①荀… II. ①李… III. ①荀况(前 313 ~ 前 238) - 管理学 - 思想评论 IV. ①B222.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6477 号

责任编辑: 杨 刚



荀子管理思想论

李慧芬 著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 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印装

规 格 16 开(169mm × 239mm)

印 张 13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08354 - 6

定 价 3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单位调换。电话: (0546) 6441693

目 录

导 论	1
一、儒家哲学的现代管理学意义	2
(一) 儒家哲学参与当代文化创新的必要性与积极意义	2
(二) 儒家哲学所固有的管理学特质	4
(三) 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意义与理论价值	7
二、荀子管理思想的研究基础	11
(一) 荀子思想研究论述	11
(二) 荀子管理思想研究综述	19
(三) 荀子管理思想的研究意义	21
(四) 荀子管理思想的研究思路	24
第一章 荀子以儒家为宗的管理思想的学理依据	25
一、荀子管理思想的学术旨归	25
(一) 宗师孔子	27
(二) 研习六经	28
(三) 肯认道德优先	30
二、荀子管理思想体系的思想特质	33
(一) 尚儒学融百家	34
(二) 崇德政尊礼法	38
(三) 讲教化重实效	39

第二章 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管理学哲学基础	42
一、“知天”与“不求知天”：管理视域的变化	42
(一)“天”的意义	43
(二)“知天”与“不求知天”的内在分际	48
(三)“知天”与“不求知天”的管理学意义	52
二、天人关系中的管理学意蕴	54
(一)“分”的思想及其在管理学中的方法论意义	54
(二)“天人之分”与管理主客体的确立	58
(三)“天人相参”与管理的本质	64
第三章 荀子“化性起伪”的管理学价值指向	70
一、性恶论与管理的功用	71
(一)价值与管理价值	71
(二)人性恶与管理的必要性	72
(三)人性可塑与管理的功用	77
二、“化性起伪”与管理的价值取向	79
(一)“伪”与管理的核心价值	79
(二)“以伪饰性”与管理的价值取向	81
(三)“化性起伪”与教化管理的普遍性	88
(四)人性论的管理学意义	99
第四章 荀子“明分使群”的组织管理模式	102
一、“明分”思想与组织结构设置的设置	102
(一)“分”与“群”	103
(二)“制礼义以分之”与组织管理原则的确立	104
(三)“明分”思想的生态意义	110
(四)“管分”、“职分”与层级管理	112
二、“善群”、“能群”与组织的效能	122
(一)“善群”、“能群”的层次性	122

(二) 君道：如何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125
(三) 臣道：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社会管理者	132
(四) “群居和一”的组织目标	135
第五章 荀子“隆礼尊法”的管理方法	139
一、礼是管理的主要手段	139
(一) 礼之起源与管理	140
(二) 礼是管理制度的主体内容	141
(三) 礼的管理功能及其价值体现	143
(四) 乐的管理功能及其价值体现	147
二、法是管理的辅助手段	156
(一) 法的意义	157
(二) 法的管理功能	160
(三) 如何发挥法管理社会的作用	161
三、礼法相成的管理模式	164
(一) 礼与法在管理对象上的区别	165
(二) 礼与法在管理境界上的差异	166
第六章 荀子“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	169
一、逐利的合理性与社会经济目标	169
二、求义的至上性与政治伦理目标	177
三、“义利两有”与社会整体目标	180
第七章 荀子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186
一、“天人相参”观念中所包含的生态管理意识	186
二、教化管理思想中所具有的卓越的社会习俗观念	189
三、“群分”思想中所蕴含的合理的层级管理思想	192
四、富民观和“养欲”观中所体现的辩证思想	193
参考文献	197

导 论

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同时代的思想家都强调了哲学与时代的关联。当今社会,人类已步入21世纪,社会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哲学家们应该如何关注时代提出的问题,现实社会又怎样才能体现出哲学的时代性关怀,以彰显哲学的现实功用和潜在价值,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所说的话给我们以启示。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 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强调了哲学对时代的贡献需要依赖于社会实践才能实现,哲学的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所以无论思想家们如何解释哲学,如何用哲学解读现实社会,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哲学的存在与发展不能和时代脱节,哲学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这个世界的关注程度,进一步地,取决于它对现实社会实践的作用大小。正如著名学者山东大学颜炳罡先生所说:“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思,它发展的最终动源是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实践。”^② 颜先生进一步指出:“哲学一经诞生,后人总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解读前人的精神遗产,因而哲学的发展过程往往表现为后人的生活体验与前人生活体验交融、冲撞、整合、再造过程,表现为后人同前人的一种深层对话。”^③ 这一切说明了,我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0页。

② 颜炳罡:《诠释·批判·重建》,《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1期。

③ 颜炳罡:《诠释·批判·重建》,《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1期。

在强调哲学的时代价值和实践功用的同时,也要看到,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的发展都不可能切断与传统的密切关系,传统哲学作为民族文化创新的客观前提和发展基础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还应关照传统哲学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有效途径。基于此,从关注哲学理论的实践性、关注中国哲学的现实生命力、挖掘传统哲学的时代价值等目的出发,用当代视角探究传统哲学的现实贡献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构成了我们探究荀子管理思想的认知基础。

一、儒家哲学的现代管理学意义

在进行儒家管理思想个案性的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从整体上考察一下儒家的管理学思想及其意义。

当代学者虽然对儒家哲学有不同的理解,但都不否认儒家哲学的经世济用特点,或者说,新时代的学者们研究儒学的出发点是期望继续发挥民族哲学的现实功用,最大限度地增强它对现实社会实践的贡献程度,以延续民族哲学的血脉。而要实现这一点,正确选择对儒家哲学的诠释角度就显得很重要了。客观地说,学者们在这一方面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笔者在学习、吸收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在认真考察儒家哲学自身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基础上,尝试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探究儒家哲学的当代价值。概括地说,儒家哲学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儒家哲学参与当代文化创新的必要性与积极意义

中华民族已有五千余年的文明史,儒家文化至今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儒家哲学思想由孔子奠基,在理论上确立了儒家“以仁为本源、以礼为表征、仁礼合一的思想系统”^①。它作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服务于社会实践,并广泛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孔子之后,经过孟子和荀子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一更加完备的思想系统逻辑地呈现出了儒家哲学既具有经世济用特点又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基本理路。到了汉代,董仲舒倡导“罢黜百

① 颜炳罡:《生命的底色》,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家，独尊儒术”，儒家哲学自此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后来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发挥了关键性指导作用。可以说，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儒家哲学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干，儒家思想主导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用至巨。儒家哲学及其文化成果历经两千多年的浸润已经固化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无时不表现在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中间虽经历了诸如佛教传入和西学东渐之类的异族文化的渗透和冲击，也经历了我们自身在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运动中对它的挹伐，但无论经受多么大的内、外部力量的侵袭，受到多么大的压制甚或摧残，儒家思想始终或明或隐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中。这既表现了儒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也由此彰显了它所固有的优秀因子，同时也表明了儒家哲学对民族性格难以消除的深度影响。这充分说明，长期以来，具有开放性的儒家文化携其思想精髓，而不断吸纳异族文化之精华并壮大自身，不仅铸就了民族的内在品格和刚强的民族精神，而且使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因这一文化浸润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绵绵不绝的儒家文化虽历经波折而经久不息，自始至终都和中华民族融为一体，共同表征着一个民族的存在。

历史发展到今天，儒家思想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不仅成就了一个民族及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而且依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重要影响力，尤其是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当今时代，表征中华民族性格的儒学不只是被国人越来越看重，并因其涵容天地的独特魅力走向了世界。这一魅力主要来自于儒学以其历史贡献而表现出来的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不可分割性。所以，今天我们提出重构民族文化，一方面要重建民族自信和民族尊严，另一方面，更是为了保持中华民族的历史延续性，毕竟对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意义上的存在更为根本，以民族文化的兴盛去标识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更有意义。因此，适时地挖掘儒家哲学的时代价值，再现儒家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张扬民族性格，体现民族精神，对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所以，无论是从历史贡献还是现实需要来说，儒家文化都必须积极参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创造过程，现阶段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如果无视儒家思想及其业已存在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将会成为无源之水而逐渐失去发展活力，文化创新也

将会因为没有依托而成为空中楼阁，最终导致民族精神的失落。而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衰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不可能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发展上希望看到的结果。当然，在探讨如何实现儒家哲学的时代价值这一问题上，认识到儒家哲学在现阶段文化创新中的重要意义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寻求一个合理的诠释角度，既能充分体现儒家哲学自身固有的特质，又能在现代社会中真正发挥它的现实功用。基于此，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探究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是笔者的一次尝试。

（二）儒家哲学所固有的管理学特质

管理与管理学是两个被赋予现代意义的概念，儒家哲学里没有管理这一概念，但古文献中可训为管理的概念很多，如“治”、“官”、“牧”等。关于“治”一字，在古代文献中可解释为治理、统治、整治、主管等。《左传·文公六年》中云：“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这可以解释为治理、统治。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的管子在中国传统管理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管子·君臣下》中记载：“治斧钺者，不敢让刑；治轩冕者，不敢让赏。”这里的“治”也是统治、管理的意思。而在孟子和荀子的表述中，这一含义更为直接和明确。《孟子·滕文公上》中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荀子在《君道》一篇中则说：“有治人，无治法。”即使到了现代，“治”仍然具有管理的意义。如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六十五》中断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而“官”字在古代也有管理的意义。《管子·权修》：“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荀子·天论》：“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说的就是官吏治理政事，管理天地万物。同样，“牧”字常与“官”字同义，也有统治和管理的意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五行五事》有这样的记载：“秋气始杀，王者行小刑罚，民不犯则礼义成。于时阳气为贼，故王者辅以官牧之事，然后万物成熟。”古代典籍中有词组“牧养”、“牧民”的用法，表达统治、管理人民及万物的意思，此类用法在古文中经常出现。汉代有“州牧”官职，为统治、管理州郡的地方长官。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儒家哲学里没有西方所谓的管理概念而断定其缺乏管

理思想,恰恰相反,儒学里的管理学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总括各派思想,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①在司马迁看来,中国古代各家哲学虽多有分歧,但思想设计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笔者认为,这一点在儒家哲学里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也是儒家哲学能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证。

1. 儒家哲学与管理思想的一体性存在

现代管理思想也是很驳杂的,管理学家们对于什么是管理也因角度不同而存在见解上的差异,但即便如此,他们大都不否认管理所具有的控制与协调意义。在此我们引入成中英先生的管理概念。成中英先生在他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一书中说:“就字义来分析,‘管’就是控制,‘理’就是顺应理性和原则创造秩序。经过一种控制来产生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能达到人们要达到的目标,这就是‘管理’了。”^②在这里,成先生把管理与秩序紧密联系起来,我们认为,这一立论是从哲学的高度来定义管理学的,它有助于我们认识儒家哲学的管理特质。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管理都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也就是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而任何管理本身都可以概括为提升人自身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建构并改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儒家思想设计就是紧紧围绕这两个方面建构自身的哲学体系的。自孔、孟以来,儒家的理想设计就是培养道德自我从而建立一个礼制昌明、秩序井然的社会。这一点在《大学》里的“三纲八目”^③中得到了充分说明。所谓“三纲”即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表明儒家的道德追求及通过教化作用所要达到的道德境界,管理理念及管理实践的出发点、过程和目标无不体现其伦理欲求。“八目”是“三纲”的具体化,它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目是内圣,后三目是外王,以“格物”为出发点,通过致知、诚意、正心达到身修即自我管理进而自我完善

①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8~3289页。

② [美]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③ 杨天宇:《礼记译注·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3~1034页。

的目的,以此为起点,进入家庭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的实践中,直到“平天下”的最终目标,从内到外、从小到大、从个体到社会、从家庭到国家,层层递进。而通过人及其推行的教化过程,儒家理念逐步放大,渗透到整个社会中,由自我的完善推进整个社会的和谐,良好的社会秩序就形成了,管理的目标也就达成了。“三纲八目”强调了道德教化在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自始至终贯穿着儒家德治主义精神,是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绝佳表述,在这一表述中体现了自我管理、与家庭、社会、国家管理的有机统一。而国家管理与社会管理、政治管理与经济管理及其管理价值、任务、本质、方法等都蕴藏在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设计里,所以儒家哲学本身就是针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管理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是在高度抽象意义上关注国家与社会的管理思想。儒家哲学与管理思想是相互渗透、相互解释并相互体现的,二者具有一体化的特质,加之儒家哲学作为官方哲学,它在现实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其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也因而使它在国家管理与社会管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哲学思想与管理理论、管理实践相互促进,长期以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哲学体系及与之相对应的管理文化。

2. 儒家哲学的管理性与管理的哲学性表现

首先,哲学的管理性集中表现在“修”、“齐”、“治”、“平”的目标设计里,儒家的思想设计主要在于一方面通过“内圣”完善自我,使自我管理达到最高境界,另一方面则通过“外王”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管理的最佳状态。从内圣到外王,在这种逐渐放大的管理目标中透视出了儒家学者对于以至善为中心、以构建王道政治为旨归的管理价值的推崇。围绕这一思想,提出的以礼为主、礼法结合的管制方法、富民裕民的管理目标,而在这方法和目标中又无时不体现着以义制利的价值选择。另外,儒家哲学在服务于社会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侧重于行政管理。儒家哲学家胸怀天下,以经世致用为学术理念,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视教化民众乃至管理社会为其当然职责。“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①,孔门高足子夏的这一论断表明了儒家学者的教育理念和学术旨归,在传统的管理实践中,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管理者,并促成了学者与官员一体化的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子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2页。

体制特色，中国文官制度的发达，在古代世界中可谓首屈一指。这一现象在儒家学者广泛参与社会的基础上又深化了其参与社会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突出了儒学的实践性和管理性特点，也使其管理思想历来倾向于政治领域，侧重于国家管理，这与现代管理学中的行政管理颇有相通之处。其次，管理的哲学性主要表现在：（1）在管理中追求伦理价值，强调自我道德修养及其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意义，这使其在管理实践中体现着浓厚的道德哲学的意味。（2）以人性理论为基础建立起人性化管理的架构。人性论思想是儒家哲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是其代表。但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儒家哲学家对人性的认识一方面是为了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以更好地管理社会和国家，另一方面是为了使管理体现人性特点，在管理实践中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总之，儒家哲学浓郁的管理特质极大地丰富并拓展了哲学的思维领域，而其管理的哲学性表现又为儒家思想以其丰富的义理资源服务于现代管理实践提供了前提。儒家哲学与管理思想的一体性表明现阶段中国式管理体系的建构具备了一个可靠的基础，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儒家哲学在较大程度上可以称作管理哲学。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意义与理论价值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关注儒家管理哲学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可能性。从历史上看，儒家管理哲学产生并作用于农业社会，其管理思想可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抽象度较高的一般性层次，即管理哲学层次；二是有技术性特点的具体层次，它是第一个层次的具体化。而对于第二个层次来说，儒家具体的管理思想主要局限于行政管理领域，这在农业社会是自然的现象，它不可能针对具有工业社会特点的管理领域如企业管理进行思想设计。但由于其管理的哲学性高度使其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并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第一个层次为我们提供了儒家哲学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另一种选择。有的学者们在关注儒家哲学的时代价值时往往将儒学与封建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并因此怀疑儒学的现代意义。这种看法实质上忽略了儒学的早期渊源及现实贡献，而且只看到了儒学在历史上的负面作用。从历史渊源上来讲，儒家哲学产生于春秋时期，即封建社会出现之前。封建社会是儒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出于封

建统治的需要，这一时期的儒家哲学有发展也有倒退。但时代总是向前发展的，儒学作为反映并服务于时代的主流文化总体来说也必然是向前发展的。正如颜炳罡教授所指出的，“作为充当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只是儒学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的某种特殊的存在状态，是儒学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并不能代表儒学的全部，也揭示不出儒学之所以作为儒学的本质”^①；而从现代社会来说，儒学在工业社会诸如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及中国的港澳台地区依然发挥积极作用，服务于现代管理尤其是企业管理，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已开始正视儒家哲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并探究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儒学与封建意识形态的脱离是可能的，儒学服务于现代社会的途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既然儒家哲学具有管理学特质，是作为管理哲学而存在的，而管理本身虽然具有工具性特点，但因其高度抽象性使儒家管理思想可服务于不同的社会，依其不同的社会背景而发挥不同的作用，那么，从管理学角度探究儒家哲学的现代性，就可以有效避免落后意识形态的干扰而使儒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服务于现代社会的作用。

基于前面的论述，我们认为，从管理学角度研究儒家哲学对于真正发挥其对现代社会实践的重大作用是有意义的。任何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存在和发展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管理与文化的相关性说明管理越发展越要受到文化的制约。正如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的观点所揭示的，他认为，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受所在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因此，中国新的管理模式的建立应是在总结以往管理经验基础上有效融合不同的管理理论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学自西方的现代管理要进一步存在和发展需借助民族文化的力量，而传统管理的现代化也只有在吸收西方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并发展自身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现代管理实践的发展要求说明了对管理的哲学省察是十分必要的。儒家思想与民族的一体性特点决定了儒家哲学有责任整合并吸收现代管理文化成果，为建立中国管理文化而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把它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推动社会过渡期中国管理模式的转型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转型不是某一方面的，应是全方位的，自然

^① 颜炳罡：《生命的底色》，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包括管理文化的转型,而要完成这一转型,首先需要中国现代管理理念新的整合。这种整合既是中国管理文化与西方管理文化的整合,也包括传统与现代的构通。我们目前的管理思想主要吸收的是西方管理模式,是一种现代化的基于科学意义上的管理理念,这类管理思想嫁接在中国传统文化之树上,无疑促进了中国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里的进步,但由于脱离了西方社会的土壤也妨碍了它的成长,而且我们现阶段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发展市场经济、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需要。我们承认西方管理思想是一种科学化的管理,是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先进管理理念,所以不能否认它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又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置根于西方文化土壤、适合西方社会发展的管理理念,所以这种管理思想对于世界现代化来讲有普遍性,但对于中国现代化来讲必然具有特殊性。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市场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远远不到成熟时期,在有些地区则处于起步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因此,现代化的途径选择自然不同于西方,不计后果地强制移植西方管理思想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目前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经济人的出现、人们道德的滑坡等现象的发生,以及利欲膨胀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背离等现实结果,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西方管理思想与民族文化脱节所造成的。也就是说,现存的西方管理思想虽然经过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改造仍然游离于中国文化环境而达不到融合的状态。因而,挖掘中国传统管理文化资源,有利于更好地吸收、整合现代管理理念,总结中国现代化管理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这将会加速中华民族新的管理文化的形成。基于此,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就显得尤其必要。换言之,中国管理文化的成功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应取决于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哲学的贡献程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研究儒家哲学所包含的管理思想有它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2. 有助于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管理文化,发挥中国文化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

在中国新的管理模式的建立过程中,我们至少应在以下两点上保持清醒的认识:第一,中国的特殊国情表明我们必然要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中国是一个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国家;另一方面,民族文化

尤其是儒家思想对民族生活依然发挥着积极的影响,民族文化的发展仍然表现了强劲的一面,并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说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对中国未来发展会带来正面作用。前者说明,管理价值之体现和管理目标之设计不能和社会总体价值和目标相违背;后者则说明,特定的管理对象要求管理方法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相吻合。第二,管理作为一种文化应和文化的多元性相一致,管理思想的多元化应该是管理学发展的常态和健康表现,所以,中国式管理的特色应和民族精神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建构一种切合中国民族性、不同于西方的现代管理模式。因此,未来的中国管理模式的存在与发展应吸取以前的教训,在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前提下建立。它至少应该在两大基础上形成:一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以来我们在管理方面的成就;二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现代的逻辑发展。这两点都与传统相关,后者是古代历史传统及其在现在的积淀,前者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积累及其开启的新传统。它们都会对中国特色的管理做出贡献,这也是我们提出中国式管理应该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3. 有助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确立和实现

从必要性来讲,任何管理实践必然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及其文化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管理体系的建立必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同时,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实践要依靠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深度融合,缺少儒家思想的支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管理实践及其管理文化的建立就会缺乏坚实的基础。所以,现阶段管理目标的最终达成需要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管理实践中做出贡献。

目前,有的学者提出和谐管理的思想,表明我们已开始正视儒家哲学理念对当代社会实践发展的重要性。从可能性来说,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并不必然对立,儒家在管理实践中重视人的作用,在管理思想上强调人性化管理,这与现代社会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有相通之处。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在道德层面上提出了高要求,这可以从儒家崇尚道德的管理哲学中寻求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持。

综上所述,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对管理的影响已显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要,管理理论发展到今天,不能不正视民族文化对管理的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正向推动意义。儒家思想作为民族文化背景在现实中的客观存在及其巨大影响力

使任何生长于其中的管理思想都必须以儒家思想作为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文化基础；而儒家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管理特质无形中加强了其作为文化背景的力量，也必然会增加对新管理模式做出重大贡献的程度，传统的管理理论将使管理的创新拥有更加稳固的文化发展基础，创新也就更加顺理成章。这充分说明，从管理的角度研究儒家哲学，可以为传统哲学服务于现代社会架起有效沟通的桥梁，并有利于促进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做点有益的工作。

而要做好这一工作，最重要的在于对儒家哲学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管理哲学进行个案性的研究，而对于先秦时期具有原创性特点的儒家人物及其思想的研究则更为必要。基于以上考虑，我们选择了发扬光大孔子思想、奠定六经独尊地位的荀子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对儒家管理哲学体系做一次个案性的有价值的探索。

二、荀子管理思想的研究基础

（一）荀子思想研究论述

关于荀子及其生平事迹，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简略的叙述：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以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谶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①

后人根据司马迁的记述也做过补充考证，但没有较大的出入。总括起来

①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8页。